

本书是昆德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因为这本书遭到官方查禁，昆德拉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流亡海外。本书在法国出版时的前言中称这部小说是“本世纪最杰出的小说之一”。该书曾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出版，但都被删掉了许多段落而面目全非。作者不时发出感叹“《玩笑》这部作品无论在东方或西方都时常遭到强奸。”

(全译本)



世界文学
名著

玩笑

[捷克] 米兰·昆德拉 著
黄有德 译



玩笑

● 黄有德 译

(全译本)

● [捷] 米兰·昆德拉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玩 笑

作 者:[捷]米兰·昆德拉

责任编辑:郭力安

责任校对:安春海

封面设计:萧 敏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吉林省社会福利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158 千字

印 张:9

版 次:199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书 号:ISBN 7-5387-1359-X/I·1310

定 价:14.80 元

代 序

他开始为世界所瞩目

——米兰·昆德拉小说初析

杨乐云

近年来,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小说在西方颇为畅销,也深受欧美评论界的赞赏和推崇。自70年代以来,米兰·昆德拉已多次获得国际文学奖,并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要了解米兰·昆德拉,先得了解产生这样一位作家的时代背景。昆德拉的祖国捷克斯洛伐克地处欧洲中心,布拉格自中世纪起便是欧洲文化名城,因此欧洲各种哲学思想和文艺潮流迅速传播到这里,在思想界和文艺界都有所反映。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两位巨匠里尔克和卡夫卡都出生在布拉格,后者短短一生还基本上就是在那里度过的。两人虽然都不算捷克作家,但多少与布拉格的文化环境有关。20年代初,十月革命的浪潮和方兴未艾的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同时从东西两个方向冲击着捷克斯洛伐克文艺界,产生了同样巨大的影响。1945年捷解放后,社会主义建设和文艺政策中无可讳言的某些失误,使原来就在捷克知识界有一定基础的某些西方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潮,特别是二次大战后在欧洲风靡一时的存在主义思潮,在部分青年作家中产生了影响。昆德拉现象出现在他的祖国,也出现在其他一些东欧国

家,这并不是偶然的,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基本思想特点:对现实生活的失望和怀疑

米兰·昆德拉 1929 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他当过工人、爵士乐手,一度曾是前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机关报《文学报》的领导成员之一。1967 年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后,他受到党内审查处分,1968 年事件后又被开除出党,1975 年起流亡法国。昆德拉是作为一名青年诗人于 50 年代初崭露头角的。他的第一本诗集《人,一座广阔的花园》出版于 1953 年。其后他写了叙事长诗《最后的春天》(1955)及诗集《独白》(1957)等。但不久他便放弃诗歌创作,潜心写小说。

虽然昆德拉现在是以著名小说家而为人所知,很少有人再提到他的诗,但看一看他早期的诗歌还是很有意思的。有一首诗题为《法拉桑城儿童浪漫曲》,发表于 1955 年,写一个孩子骑着小马驶进一座美丽得象甜奶饼似的城市——法拉桑城,娶了那里的公主。这座城里有个奇怪的规定,人人只许欢欣,绝对不能有忧伤情绪的流露。一只孤独的小狗哀嚎了几下便被投进了监狱。公主很漂亮,乐队为他们奏乐,人们在欢呼,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天天如此。孩子感到厌烦,他对小马说:这里老是欢呼、歌颂、喊万岁,我腻味透了,不如逃走。但是我已结了婚,丈夫能逃离自己的妻子吗?小马劝他以后多加注意,带他离开了这“甜蜜的天堂”。最后孩子问他父亲:你常说世界有一天会像甜奶饼,它不会跟法拉桑城一样吧?从这些诗歌可以看出,昆德拉从创作一开始,便表现了他后来在小说创作中有所发展的基本思想特点:对现实生活的失望和怀疑。

小说的重要主题： 展示人类生活的悲惨性和荒谬性

西方评论家常把昆德拉同奥地利作家海爾曼·布羅赫相提并论，认为昆德拉的小说深受他的影响。布羅赫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存秩序持否定态度，认为当前的时代是一切价值和人性崩溃的时代，现存的一切都值得怀疑。昆德拉从自己特定的环境出发，把世界看成罗网，小说家的作用就是对陷入罗网的人类生活进行调查。因此，怀疑和背叛一切传统价值，展示罗网中人类生活的悲惨性和荒谬性，就成了昆德拉小说的重要主题。也许，正是由于开掘这样的主题诗歌有其局限生，昆德拉才放弃诗歌而转写小说的吧。

昆德拉的主要小说创作有：长篇小说《玩笑》(1967)、《生活在别处》(1973)、《为了告别的聚会》(1976)、《笑和忘却集》(1976)、《存在中不能承受的轻》(1984)和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1968)等。他的长篇小说中唯有《玩笑》一书在他的祖国公开出版过。这部小说完成于1965年，但直到政治动荡趋于激化的两年以后方始问世。小说出版后反应强烈，短期内便再版两次。西方也竞相翻译出版，1968至1969年，该书除译成欧洲各主要语种外，还译成了日文和希伯来文。正是这部小说使米兰·昆德拉的名字开始为世界所瞩目。

昆德拉的小说情节一般都不曲折，也没有多少细致入微的人物性格刻画，总的来说，是哲理性多于故事性。《玩笑》也不例外。大学二年级学生、党的积极分子、学生会干事卢德维克爱上一年级的女同学玛尔盖达，期望同她共度暑假并确定关系。玛尔盖达思想单纯、幼稚，学校党组织为了锻炼她，决定派她参加暑期党员集训。玛尔盖达兴高彩烈地去了，她从集训地写信给卢德维克盛赞那里的生活如何有意义，气氛如

何健康,对于失去与卢德维克共度暑假的机会,则毫无惋惜的表示。卢德维克一时气愤,他买来一张明信片,写了三句话:乐观主义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健康气氛散发着愚昧的臭气!托洛茨基万岁!他是作为一个玩笑将这张明信片寄出的,却不曾料到为此他付出了何等代价:他被开除党籍、学籍,被当作人民的敌人下放到矿区劳动,在压抑、痛苦中度过了十五年。之后,随着政治气候的改变,他终于回到大学,完成了学业,进了某研究机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见了当年带头批判他的党小组主席才曼内克的妻子海伦娜。长期积压心头的仇恨使卢德维克决定骗取海伦娜的感情,以便通过与海伦娜的一次幽会报复才曼内克。但是,当他如愿以偿,确信已狠狠地羞辱了才曼内克时,却发现海伦娜早已同丈夫感情破裂,才曼内克不仅另有新欢——一个比海伦娜年轻十三岁的漂亮女人,而且已摇身一变成为反斯大林主义的英雄,为青年学生所崇拜。

尽管昆德拉的小说都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思想立场鲜明,但是他反对人们把他的小说同某种思想性联系起来。1980年,西方某电视台举办昆德拉小说创作研讨会,会上有人谈到《玩笑》一书时,称这部小说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有力控诉”。在座的昆德拉马上插话:“请别把你们的斯大林主义难为我了。《玩笑》是一本爱情小说。”他认为西方新闻界这种“过于简单化”的解释和他的作品在本国被禁止出版一样,都“妨碍一部艺术作品用自己的话语说出自己的真实”。其实《玩笑》这部小说并不仅在于描写了一桩政治错案给主人公造成的巨大痛苦。它还让人们通过书中人物的命运看到这样一种“真实”:世界的荒谬性。卢德维克开了一个愚蠢的玩笑落进罗网;为了洗雪自己的冤屈,他设下一个罗网使绝对无辜的海伦娜蒙受了难以挽回的羞辱和心灵创伤;但更为可悲的是,卢德维克最后吃惊地领悟到在年轻一代的眼里,他和才曼

内克都属于那个“黑暗、遥远的年代”里的“一个混乱的整体”——一个“被过份的政治化思维和难以理解的术语败坏了的整体”。无论他和才曼内克之间有过什么样的矛盾和仇恨，无论他的冤屈有多深，在年轻一代的眼里统统消解了，变得微不足道。他发现自己落进了捉弄人的历史的罗网。作者在为《玩笑》英译本作的序言中写道：海伦娜、卢德维克和小说中的其他一些人“被乌托邦的声音所迷惑，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可是当门扉在身后砰地一声关闭了时，他们却发现自己在地狱里。”

忘却——小说的另一个主题

历史捉弄人，过去的冤屈被年轻一代淡忘了；昨天的事情被今天发生的事情淡化了。忘却——这是昆德拉的小说喜欢探索的另一个主题。冤屈、仇恨、暴行、血腥屠杀，这一切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解，被人忘却，在昆德拉看来，这正是道德堕落的表现。昆德拉在另一部小说《笑和忘却集》中借米雷克之口说出的一句话经常被西方引用：“人同权力的斗争是记忆同忘却的斗争。”但是昆德拉认为忘却这个主题还有着更丰富的内容，仅仅看到它“绝对不公正”的一面是不够的。因为“忘却既是绝对的不公正，也是绝对的慰藉”，人类有一个天性，总是下意识地希望忘却自己的失败和耻辱，怀有一种“改写自己的历史，改变过去，抹掉自己和别人的足迹”的愿望。小说家之所以永远有题材可写，永远能发现并“说出自己的真实”，也就在于人有忘却这个特点，忘却了过去，忘却了历史，特别是忘却了“人的存在”。因此小说家的发现也许已经陈旧，但读者仍会感到新鲜。

我的敌人是媚俗

昆德拉业已问世的小说中,给他带来更大声誉的是长篇小说《存在中不能承受之轻》。这部小说以1968年事件为背景,描写了几个知识分子的感情生活以及他们在重大政治形势面前作出的人生选择。如果说昆德拉在《玩笑》和其他几部小说中还主要是通过描写人物的命运以及在这种命运下他们的心理状态来表达作者的某种哲学观点的话,在《存在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对一系列的哲学问题、政治问题、艺术问题、小说创作问题等等进行的思考、阐释和辨析所采用的方式则比较直露:作者往往直接出面或借人物之口发表大段大段的议论。小说的情节也比前几部更为松散,形式更象散文。作者广引博证,说古道今,借古喻今,直露中带着含蓄,寓哲理于生活细节。应该说昆德拉的创作正是通过这部小说登上了新的高度。

不过,这部小说能对了解昆德拉及其创作有更多的认识价值,还在于小说中作者在诸如轻与重、灵与肉、忠诚与背叛、诚实与谎言等问题上,尤其在“媚俗”^①问题上所阐述的观点。小说用相当大的篇幅论“媚俗”。这大概同被他视为至理名言的海·布罗赫的一句话有关系:“现代小说英勇地与媚俗的潮流抗争,最终被淹没了。”关于媚俗,昆德拉解释说,媚俗就是迎合和取悦大多数人,“不择手段去讨好大多数人的心态和做法”。一切宗教和政治运动都依赖于媚俗,“把有既定模式的愚昧用美丽的语言和感情乔装打扮起来”。他认为在“极权统治下”,个性、怀疑、嘲讽都不被允许,因为它们偏离既定的思维模式,同媚俗格格不入。小说中,萨宾娜视媚俗为死

^① 媚俗(Kitsch):德文原意为艺术上的矫揉造作。

敌，她的一生是由一连串的反叛组成的：反叛清教徒式约束她的父亲、反叛共产主义、反叛丈夫——她嫁给他仅仅因为此人怪癖，为社会所不容，最后她又反叛了真诚爱着她的弗朗茨，原因是弗朗茨公开了他俩的关系，违背了她的隐私生活不得泄漏的原则。反叛使她着迷，对现实生活和一切传统观念都抱着怀疑和挑战态度。她不相信在有人群的地方可以有诚实。“在有人睁眼盯住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在我们迫不得已只能让那只眼睛盯着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有真实的举动”，这“就意味着生活在谎言之中”。学生时代，她千方百计逃避参加庆祝五一节的游行，称之为“当局媚俗作态的样板”，把“人们举着拳头，众口一声地喊着口号齐步游行”看作“邪恶的形象”。这里不免使我们想起昆德拉早期的诗《我在离去》。略有不同的是，“离去”后的萨宾娜发现美国参议员的微笑同站在布拉格广场检阅台上当权者的微笑性质上是一样的：媚俗作态的。弗朗茨参加的西方社会名流组织的柬埔寨大进军也不过是一场媚俗求宠的庸俗表演而已。于是，《我在离去》的作者三十年后喊道：“我的敌人是媚俗，不是共产主义！”引人深思的是，萨宾娜在怀疑了一切，反叛了一切之后，最终并没有得到欢乐和充实。她一生不为任何传统观念所束缚，身上没有任何负担，无比轻松。然而这种轻却使她感到不堪忍受，是空虚。那么，人们不免要问，她一生的反叛有什么意义呢？也许这就是昆德拉所说的一部小说的精髓之所在吧，这精髓是：深含不露的反讽。

有价值的长篇小说已经诗歌化

昆德拉对小说艺术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曾在不同的场合反复阐明这样的观点：长篇小说自福楼拜创作《包法利夫人》起在艺术上已提高到诗歌的美学要求，也就是说真正有价

值的长篇小说已经诗歌化。这里说的诗歌化绝不意味着抒情化。他认为所有的伟大小说家如福楼拜、乔伊斯、卡夫卡都是反对抒情的。用了将近五年时间才写出《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曾说过：“在所有的表现中间，所有的形体中间，所有的样式中间，只有一个表现，一个样式和一个形体表现我的意思。”他选择的每一个字都有一定的内容。昆德拉也是这样，他认为长篇小说诗歌化、就是指写小说象写诗一样：推敲每一个字眼，注意文字的音乐性，重视在每一个细节中表现独创性。昆德拉非常重视小说中的细节描写，因为他“对人类生活进行的调查”是通过一件件看似平常的小事一步步揭示其意义的。《玩笑》中卢德维克回首往事时说的一段话对于我们理解作者的小说艺术可能有所启迪。卢德维克若有所思地说：“生活中每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它的背后都隐含着个意思，具有某种意义。生活通过日常发生的事情在向我们说明它自己，在一步步揭开一个秘密”，这里“有一把打开真理和神秘之门的钥匙”。昆德拉认为正因为小说已经诗歌化，小说的翻译就成为一种真正的艺术。当昆德拉发现《玩笑》最初的英译本任意删改了他的原文时，他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一封抗议信，要求读者不要接受这个译本，不要把它看作是他的小说。后来，他又亲自动手将《玩笑》的法译本从头至尾修改了一遍，因为他觉得原译本的风格与他的不符。他认为一个好的译本不在于译笔如何流畅，而在于“保留原作全部罕见的和新颖的表达方式”。他的这些话对于我国翻译工作者来说，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

目 录

他开始为世界所瞩目(代序)

——米兰·昆德拉小说初析	1
一、卢德维克	1
二、海伦娜	10
三、卢德维克	20
四、雅罗斯拉夫	106
五、卢德维克	143
六、科斯特卡	184
七、卢德维克 雅罗斯拉夫 海伦娜	212

一本禁书的坎坷历程

——《玩笑》评析	269
----------------	-----

卢德维克

哦，到了，多年以后我又重返故里。站在广场上（在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我曾无数次打这里走过），我没有感到任何激动；我只是觉得，这块平地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阅兵场，高耸在众多屋顶上的市政厅尖顶，就像是一个戴着古代头盔的士兵；这个摩拉维亚城市曾经是抵御马扎尔人和土耳其入侵者的堡垒，往昔的战争在它的外表上刻下了一系列不可磨灭的丑陋的痕迹。

多年来已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吸引我的了；我对自己说，对这个地方我没有留下任何感情，这似乎十分自然：我离开这儿已有十五年，我的朋友或熟人几乎都已离去（包括那些我想避开的人），我母亲葬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一个我从未光顾过的坟墓里。可是我一直都在欺骗自己：我以为这是冷漠，事实上却是嫌恶；我没有看出这种心理，因为同在别处一样，在这儿我既有愉快的经历，也有不愉快的经历，但仅此而已；正是这次旅行使我意识到：把我带到这儿来的使命在布拉格也可以轻易完成，如果在这里，在我的家乡，我才突然觉得不可遏制地看清了这一点，那是因为整个念头是如此玩世不恭、卑鄙无耻，以至于我是出自对往事伤感的依恋而回到这里的任何怀疑都受到了嘲弄。

我最后讥讽地看了一眼不雅观的广场，转身背朝着它，动身去我在那儿订了一个房间过夜的旅馆。看门人从木牌上取下一把钥匙递给我，说：“二楼。”房间实在不怎么样：靠墙有一张床，中间是一张小桌和椅子，床边是一个外观华丽、带有镜子的桃花心木衣柜，门旁有一个破旧的小脸盆。我把皮包放在桌上，打开窗户：窗户面朝着一个庭院和比邻楼房光秃肮脏的背面。我关上窗子，拉下窗帘，走到脸盆前，那儿有两个龙头——一个蓝色，一个红色；我拧开它们，冷水从两个龙头里流出来。我打量了一眼桌子，还不算太差；至少可以放一个水瓶，两只杯子；问题是只能坐一个人；只有一把椅子。我把桌子推到床边，试着坐下来。可是床太低，桌子太高；此外，床在我的重量下陷得那样低，以至于我顿时就意识到，它不但作为一个座位不能令人满意，而且作为一张床也不能起到它的作用。我用拳头撑住床，然后躺下去。小心翼翼地抬着腿，以免弄脏毯子。床凹得很厉害，我简直觉得我是躺在吊床里。真不能想象什么能和我共享这张床。

我在椅子上坐下来，瞪视着半透明的窗帘，开始想心事。这当儿，从过道里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两个人，一男一女，正在谈话。我能听懂他们的每一句话：一个叫彼得的男孩从家里逃走了，他的婢娘克拉娜是一个傻瓜，惯坏了这孩子。接着，一把钥匙在锁眼里转动，门开了，谈话声仍在隔壁房间继续；我听见那女人在叹气（是的，甚至她的叹气也能听见！），那个男人决定给克拉娜一个最后的忠告。

等我站起来时，主意已定；我在脸盆里洗了手，用毛巾擦干，然后离开了旅馆，虽然我并不清楚到哪儿去。我所知道的是，如果我不想破坏这次旅行（漫长而艰辛的旅行）的成功，除了得到一个本地熟人周密的帮助，我没有别的选择，尽管我很讨厌这个想法。我头脑里掠过从青年时代起所有的熟面孔，

把他们一一都否决了，只要由于所提供的帮助的机密性质需要我越过这道鸿沟，说明我为何多年在外——一种我不愿做的事。但是，接着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新来的人，这个人我曾帮他找过工作，要是我果真了解他，他会非常高兴以德报德的。他是一个奇特的人物，既审慎地严奉道德，又古怪地浮躁不安，反复无常，就我所知，几年前他的妻子跟他离了婚，因为他从来不同她和儿子在一起生活。我有点紧张：如果他再婚了，这将使事情变得相当复杂。我尽可能快地朝医院的方向走去。

当地医院是一个由楼房和分隔部组成的综合建筑群，散布在一大片绿化地区；我走进大门旁边的传达室，要门卫为我接通病毒室，他把电话往工作台边沿一推，说：“02。”我拨了02，结果得知科斯特卡医生刚刚离开，到外面去了。我在大门附近一张板凳上坐下来，以便不会错过他，一边瞧着穿着蓝白条纹的医院长袍在各处闲荡的人们。然后我看见了：他沉思着走来，又高又瘦，引人注目地没有吸引力。是的，正是科斯特卡，没错。我站起身，照直迎向前去，仿佛有意要碰撞他；起初，他恼怒地看了我一眼，但是接着他就认出了我，随即张开了臂膀。我觉得他的惊喜超过了他的愕然，他那毫不做作的欢迎很给人鼓舞。

我解释说我刚来不到一小时，为了一些不必要的事要在这儿耽搁两三天；他立刻对我说，我首先想到来看他，他是多么惊讶和感激。突然，我感到自己别有用心，并且出于算计而又不是真正的兴趣提出我的问题（我快活地问道：“怎样？又结婚了吗？”）是很不对头的。他告诉我（这使我宽慰）他仍是单身一人。我提出我们有许多话要谈。他表示同意，但抱歉地说他只有一个多钟头的时间，然后他得回医院当班，夜里又离开城镇。“你是说你不住在这里？”我失望地问。他让我放

心，他住在城里，他在一个新村有一个单身房间，但是，“独身生活是没有益处的。”原来科斯特卡有一个未婚妻，住在十五哩外的另一个城镇，他是一个教师，有一套两个房间的寓所。“那么，你最后将跟她搬在一处？”我问。他说他未必能在那儿找到一个好工作，像我曾帮他找过的一样有趣，而他的未婚妻要在这儿找到一个工作也很麻烦。我开始（十分真挚地）咒骂官僚主义的失职，不能将夫妇安排住在一起。“冷静点，卢德维克。”他带着温和的宽容说，“像这样也并不太坏。来回旅行当然得花时间和费用，可是我却保持了 my 独处不受影响——还有我的自由。”你的自由对你干嘛就那么重要？”我问他。“那么你的自由对你干嘛就那么重要。”他反问道。“我喜欢和女人交往。”我回答。“我需要自由不是为了女人。”他说，“我是为了我自己。喏，到我的住处去，直到我离开，怎么样？”这真是再好不过了。

离开医院区不久，我们来到一处建筑物前，楼房鳞次栉比地矗立在一块凸凹不平、满是尘土的场地上（没有草坪，小径或道路），在城市和远处的原野之间形成一道可怜兮兮的屏障。我们走进一道门，爬上狭窄的楼梯（电梯出了故障），到了三楼，在那儿我看见了科斯特卡的名牌。当我们从门道走进主房间时，我愉快地看到角落里有一张宽大舒适的床，还有一张桌子，一把安乐椅，琳琅满目的书籍，一架唱机和一台收音机。

我赞扬了这布置，并问起浴室。“一点也不奢华。”科斯特卡说，对我的兴趣感到高兴。他引我回到门道，打开一扇门。这是一间小而舒适的浴室，浴缸、淋浴和脸盆样样俱备。“看到你这个好地方，使我有了一个想法，”我说，“你明天下午和晚上做什么？”“很不巧，明天我要工作到很迟。”他歉意地回答，“我要到七点钟左右才回来。你晚上有空吗？”“也许有，”

我回答，“不过你能把这个住处借给我一个下午吗？”

我的要求使他感到诧异，但他立刻（好像担心我会认为他不乐意）回答说，“我很高兴让你享用它。”接着，他审慎地试图避免猜测我的用意，加了一句，“如果你今晚需要一个地方睡觉，尽管留在这儿好了。我要到早晨才回来。不，甚至那时也不会回来。我会直接去医院。”“不，没有必要。我在旅馆有一个房间。问题是，旅馆房间不是很舒适，而明天下午我需要一个舒适的环境。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当然。”科斯特卡说，垂下眼睛。“我也这样想。”我顿了一下，然后补充说，“我很高兴能够帮你忙。”又顿了一下，“提供它的确是一桩好事。”

然后我们在桌边坐下（科斯特卡倒了咖啡），聊了一阵（我试了试床，满意地发现它很结实，既不凹陷，也不吱嘎作响）。不久，科斯特卡说他该回医院去了，他很快教给我主要的家务事项：浴缸的龙头需要格外拧紧，与通常采用的程序相反，热水只有从标着C符号的龙头才能得到，收音机的插座藏在床下，食橱里有一瓶新开的伏特加。他给了我两把串在一起的钥匙，告诉我哪一把开楼房的大门，哪一把开他的寓所。在屡屡换床的一生中，我已养成一种对钥匙的个人迷信，于是我窃喜地把科斯特卡的钥匙揣进我的口袋。

在我们往外走时，科斯特卡表示希望他的寓所会有助于“一些真正美好的事。”“是的。”我说，“它会帮助我做一桩美好的毁灭工作。”“那么你认为毁灭会是美好的。”科斯特卡说。我暗自笑了，在他的反应中（不动声色地表达一个异议），认出了我十五余年前初次遇见的那个科斯特卡。虽然我喜欢他，但我也发现他有点可笑，于是我回答说：“我知道在上帝永恒的建筑工地上，我是一个温和的工作者，不喜欢听到有关破坏工作的事，但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恰恰不是一个上帝的